

南宋浙东学派功利主义教育思想述评

陈安金

(温州大学文化研究所,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在教育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和教学的理论和观点,形成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比较系统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其中有不少精辟、独到之处,对于今天的教育实践仍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浙东学派;教育思想;功利主义;务实;因材施教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2005)06-0066-13

南宋浙东学派以事功思想而著称,其教育思想则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陈亮、叶适、吕祖谦、唐仲友等代表人物,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提出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教育思想,其蕴含的真知灼见对后世教育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总体上来把握该学派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想,即教育目的、内容、制度和办法,作为引玉之砖以求教于学界。

一、经世致用,教育救国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高度重视教育,深刻认识到教育对于巩固统治,维持国之兴衰的重要作用。其思想贯穿在批判以培养“醇儒”为宗旨的理学教育的过程中,体现在反对以应付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学校教育的思想中,强调教育应为现实服务,把培养学以致用、能匡世济时的“非常之人”作为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标,这是南宋浙东学派共同的教育主张。

唐仲友认为,对教育的重视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与兴衰,他说:“治道之缺自教始,其复也难……教不至则刑有所不行,民之讹言莫惩也,教之未至也。”(《悦斋文钞》卷5《八政说》)只有重视教育才能调正风俗,因此他又说:“为国者,明教以正俗。”(《悦斋文钞》卷8《诗论》)概言之,要想治理好国家,其有效的办法只有抓教育,从提高人的素质着手:“行乎地者,莫神于风,行于国者,莫神于教。治,莫善于教。”(《愚说·治教篇》)吕祖谦把振兴教育与“拯救衰世”、“雪耻图强”联系起来,认为搞好教育可以达到整飏风化、严肃纲纪的目的,认定“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推其病源,皆由讲学不明之故”。(《吕东莱文集》卷5《与学者及诸弟》)他提出,教育的目的为“明理”、“治心”,宗旨为“育实材而求实用”,这里的“实材”是指不仅具备“道”,而且能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拿出救国的具体办法,并积极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际活动中的实干家。叶适提出兴办教育的出发点是培养选拔“材智贤能”之士,认为“图此大事(富国强兵,恢复中原),莫先人材”,而人才则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人材之用,必常

收稿日期: 2005-04-05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N03LS14),温州大学科学研究基金(X03032)

作者简介: 陈安金(1965-),男,浙江乐清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

与其国其民之命相关，治乱兴衰之所从出也”（《习学记言序目》卷 39），又言“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国之命系焉”（《水心别集》卷 13《科举》）。这种人才“其规营谋虑，无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义，无一时之利而为万世之计”，能承担起“恢圣业而共治功”的重任（《水心别集》卷 13《科举》）。陈亮则主张讲学授徒以天下大事为己任，培养能干英雄伟绩的各种人才，从而承担起救国、保国、治国的重任。实际上，这是陈亮在自己的抗金救国大志未能付诸实施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教育，让更多的人树立起救国保国的凌云壮志，以实现他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这也是南宋事功学派“以适用为主”功利主义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其最高目标是培养“非常之人”，即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文武兼资，本领宏大，能开拓古今，建功立业的“雄伟豪杰之人”，这种人有敢于“斥百家之异说”、“言当今之利害”（《陈亮集》卷 27《与徐彦才大谏》）的气魄，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志向，具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质，经得起“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陈亮集》卷 28《又甲辰秋书》）的严峻考验。其最低目标是“学为成人”，具备“智”“勇”“艺”等基本条件，能担当得起“世界轻重有无”（《陈亮集》卷 28《又乙巳春书之一》）。他向皇帝提出“变通三策”，其中之一便是要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指出只有通过现有教育、用人、科举制度的全面改革，使士人能“成其才而充其气”（《陈亮集》卷 27《与徐彦才大谏》），使朝廷“任贤使能”，“尽收天下之人材，长短小大，各见诸用”（《陈亮集》卷 11《廷对》），方能重振国势，完成复土大业。可见教育显得尤为关键。他说：“自汉以来，其间治乱不常，往往以学校为国之先务，未尝有得一日之安而不从事焉。”（《陈亮集》卷 14《问学校之法》）要图谋国家的兴盛，首先就必须发展教育，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

各人在论述教育的出发点时虽然言辞表达不一，但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关于教育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作用的思想却是一致的。南宋浙东学派这种以培养对国家、社会有用人才的思想，是鉴于现实而有感而发的。南宋苟安于江南，北方金兵南侵，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而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现状则是：理学家大谈所谓“醇儒”和“道学之士”，以教育心性为宗旨；而朝廷教育则一味强化科举。其结果是，国家动乱之时，而“人才衰弱”。浙东学派的学者已深切体会到如果南宋政府能使人各就其用，定能化危为安，“若淮汉千里果当固守，四处大军果当精练，四方之才，随其大小，宜付一职，使之观事揆策，以身尝试。习熟渐久，方能舍燕安而乐粗涩，易脆腐而为坚强，劲虜在前，行者思奋。”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认识，他们将教育的出发点定为培养能为社会所需的实用之人。

二、学贵务实，广通博洽

自隋朝兴科举以来，通过科举成名则成为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读书则成了叩开仕途之门的敲门砖。由于教育的宗旨和目标是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所决定，浙东学派对教学内容也提出实事求是学的要求。科举考试内容空洞无物，尽是那些无用的“程式之文”和为人所轻的“黄策子”，中举者多缺乏真才实学，学与用严重脱离。正如吕祖谦所说：“后世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观国家之事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异时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以天下之事，便都是杜撰。”（吕东莱文集卷 16《周礼记》）叶适也说：“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则为妄作矣”（《水心别集》卷 11《经总制钱二》），从而造成“人之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俛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隳，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水心别集》卷 10《实谋》）的恶果。陈亮也提出，在这种教育制度下，生员们埋首书册，多数人不追求真才实学，而只以“猎取一二华言巧语，缀辑成文而为欺罔有司之具”，“其心

安得而厚，其材安得而成乎？”（《陈亮集》卷14《问学校之法》）可见，这样根本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且对社会有实用的人才。

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当时的教育现状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根据社会实际需要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强调学贵务实，内容要广通博洽。

唐仲友的教育思想精髓部分之一就是“学贵务实，经世致用”，他说：“为学之道，在于务实，而专心务实则可用，专心则有功，此学之大要也。画地为饼，无救于饥，紵絮三千，无益于寒。学而不务实，其无用亦犹是也。”（《悦斋文钞》卷8《学论》）将学不务实之结果比喻得何等的通俗与透彻！

吕祖谦指出读书学习当“求实用”。“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邪？”（《吕东莱文集》卷20《杂说》）而读圣贤之经典，尤以能用于事为贵。“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人之言过于六经哉？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吕东莱文集》卷20《杂说》）从读书讲究实用出发，学者必须具备务实的精神，他说：“大抵为学，不可令虚声多，实事少，非畏标榜之祸也，当互相激扬之时，本心已不实，学问已无本矣”。（《吕东莱文集》卷20《杂说》）他这一观点与叶适批判理学家“虚声多而实力少”的观点是一致的。

陈亮认为，设立学校不仅是对人进行道德教育，还应使人掌握各方面的技艺和才能，使其能适应社会的各种需要。他说：“三代立学于天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乐、射、御、书、数，所以广其心而久于其道也”（《陈亮集》卷14《问学校之法》）。“天子设学校于行都，使之群居切磋，朝暮讲究，斥百家之异说而不以为诞，言当今之利害而不以为狂，所以养成其才而充其气也”（《陈亮集》卷27《与徐彦才大谏》）。故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各种史书，抑或诸类兵家、山川、形势、量度权衡、官民商农等知识皆应成为教育的内容，以面向现实，切于实事，符合经世致用的要求。唐仲友也认为学艺是求学者所不可缺少的。他说：“古之学者兼于艺”（《悦斋文钞》卷8《道艺论》）。他拿古代的周公、孔子两大圣人来批驳那些看不起艺技的伪君子，他说：“古之学者其兼于艺可谓勤矣，后世不然，《礼》、《乐》不素习，曰：‘吾将求其义’。《射》不屑为，曰：‘吾将专其文’。《书》、《数》不求精，曰：‘吾将志其大’。见簠簋笾豆牲牢珪币之陈，则曰：‘彼有司存焉’……周公大圣人也，而曰：‘多材多艺’。孔子大圣人也，而曰：‘执射执御’。况下于周孔者而可耻于艺乎？”（《悦斋文钞》卷8《道艺论》）

而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在批判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强调用儒家经典中的“治心修性之学”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的同时，提出事功实学同样存在于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之学中。所不同的是理学教育家们只是阐发天理性命的的内容，如所谓“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学规类编·丛书集成初编》）而浙东学派的学者则重在挖掘其中的经世致用的事功实学知识。他们认为讲授儒家经典的目的是让受教育者用儒家的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而是应该在深刻领会“六经之大旨”的基础上，面向现实，切于实事，学以致用，更好地为国家、社会建功立业，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圣人作经之大旨”。陈亮指出，学习《六经》，主要应学孔子的经世思想。他认为，孔子“进而经世，退而著书”（《陈亮集》卷19《杨雄度越诸子》），而《六经》实际上是孔子的经世之作，特别是《春秋》，更是其经世思想的集中体现。故《六经》之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也都具有“切于世用而不悖于圣人”（《陈亮集》卷19《杨雄度越诸子》）的思想。所以陈亮强调必须把儒家经典作为古代文献，将其看成是对古代历史的总结，从中找出成败兴亡的经验教训，作为当今兴功立业的借鉴。那些直接经世致用的历史书籍，

无疑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

叶适主张教育内容要广博。他在《进卷》中所论述的内容，涉及到纲纪、治势、国本、民事、法度、财计、军旅、纪制、官法、兵权、士学、学校、科举、铨选、资格、赋税、役法等许多方面。叶适还十分重视艺能，提倡学艺能以理百事，他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提出：“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以使协其居者”。虽然，他并不主张学生一定要直接去从事耕作、操练艺术，但认为这些知识是佐治人才必须知晓的学问，是培养人才进行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唐仲友认为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既不能求之太缓，也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端庄严肃，否则适得其反。因此他说：“教，不可以有慢心，亦不可以有急心，临之不莊，人将我侮，求之太速，人将我欺，正己而缓于人，其庶几乎？”（《愚说·治教篇》）但当时教育制度松弛，学校秩序混乱，是南宋官学的一大弊病。南宋浙东学派对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所存在的各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逐渐使之理论化、系统化。

叶适主张：“法度不立，而学为不用”（《水心别集》卷3《进卷·士学下》），只有建立起正常良好的教学秩序，形成一套严格的管理规章制度，才能提高教学质量，使人才的培养有可靠的保障。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虽设有各级官学，但由于“无取世之法，无考察之意，学官与诸生泛泛焉不相知名，无教无劝。幸其岁满，则掉臂而去”。贤能者不屑入学，而昏眊者聚于学，学校遂成“弃材之地”。因而他提出国家在重视太学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对州县学校的整顿和考察，州县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基石。叶适建议“州县之学，宜使考察，上于监司，闻于礼部，达于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进于太学，或遂官之。”（《水心别集》卷13《学校》）这样才能使人才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培养和锻炼，使之不至于半途而废。

当时的科举制度，“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陈亮集》卷34《东阳郭德麟哀辞》），使“才者以蹶驰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陈亮集》卷1《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更可悲的是造就了一批“抱规矩准绳之大器，爱毫发丝粟之小才”（《陈亮集》卷26《谢曾察院启》）的社会人才。各类学校，无论是中央的太学，还是地方的各级郡县之学，抑或是乡村的私塾，实际上无不以应科举做官求名为目的，社会教育和人们的学习目的已走上歧路，教育则成了科举的工具。社会上追名逐利之风盛行，官场之风败坏，“奔竞成风，干谒盈门，较权势之轻重，不胜其求。”（《水心别集》卷13《荐举》）叶适认为这种陋习始于秦桧当政以来，“及秦桧为相，务使诸生为无廉耻以媚己，而以小利啗之，阴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风。献颂拜表，希望恩泽，一有不及，谤议喧然，故至于今日，太学尤弊。”（《习学记言序目》卷44《荀子·劝学》）浙东学派的学者们对这种风气和腐朽的选拔人才、任免官吏的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宋代任官“循资格”“论资排辈”，“阶官，则升改于荐削而叙进于年劳；列职，则平进于资格而躡用于堂除；禄，则视其品之崇庳而随所涖之厚薄；地，则立五等之虚封而为郊祀之常典；文武之贴职，则又以均出入之劳而不必其真有功也”，陈亮则大声疾呼：“此尚可久而不变乎？荐举、磨勘之弊，若之何而可革？资格、堂除之法，若之何而可久？”（《陈亮集》卷14《问任官之法》）叶适则指出：“无有流品，无有贤否，由出身而关升。……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而已矣。若是而欲以举贤才，起治功，其可得乎？”（《水心别集》卷12《资格》）而这样则只能导致“人皆弃贤而为愚，治道日坏而不自知”的严重后果。

针对“荫补”制度，叶适认为：“人臣不以道而得贵仕者，在其元身自宜削夺，而今也子孙仕宦，不知艺极，骄侈无忌，自称世家，将传世之所谓贤者何以劝焉？”（《水心别集》卷 13《任子》）难怪要发出这样的责问：“岂以为是庸庸无所短长之士，而必使继世为之邪？”（《水心别集》卷 13《任子》）故“天下患公卿士大夫之子弟不学无能而多取天子之爵禄”（《水心别集》卷 3《官法上》）。他提出，即使真的要实行这种制度，也应该针对那些“职任功效或见称于天下”的有功之臣，并“稽其人之有功无功，贤与不贤”（《水心别集》卷 13《任子》），视情况考虑是否给予“荫补”。而对于一般“公卿大夫之子弟”，应该“养之于学校，择天下之明师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才器卓然，可以为国家用，则于此乎官使之”（《水心别集》卷 13《任子》）。实际上，此批判不是从根本上加否定，但在这里明确指出了以学校教育来弥补其弊端的实际意义。

对于“荐举”制，叶适指出：“何谓‘荐举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荐举天下之卑官，宜若为善法矣，而今乃为大害。”（《水心别集》卷 13《荐举》）而这种荐举制度是导致许多人献媚权贵，败坏社会风气的一个罪恶之源。“卑身屈体以求之，仆隶贱人之所耻者而不耻也，此岂复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脱乎此也，抗颜壮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为卑身屈体之状以进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则以此荐举，以此举人”。（《水心别集》卷 13《荐举》）他认为要革除其弊端则必须严格荐举制度，对被荐举者进行实绩考察，如果其“积日计月而无在官之过”，则可以“循至于次第之京官，毋必举焉”（《水心别集》卷 13《荐举》）。对荐举者奖其“荐举之明”，惩其“荐举之失”。荐举者如果“不困于求者之多，庶几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举其贤能以报上矣”（《水心别集》卷 13《荐举》），那么“则庶几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汲汲焉为是卑身屈体以求之，而仆隶贱人之所耻者亦或知耻矣”。（《水心别集》卷 13《荐举》）

储才养士是任官的基础，而学校教育则是储才养士的基石，改革学校教育乃当务之急。学者们对现存教育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也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改革措施，但终究无法从根本上认识造成这些流弊的本源乃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局限。

四、承前启后，独树一帜

除上述对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制度的改革主张外，浙东学派的学者们还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这是他们长期读书和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

对于教育者而言，要以身赋教，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求同存异以求教学相长。

他们批评那些“徒守其师传之妄以教人”的“陋儒”（《习学记言序目》卷 44《荀子·劝学》）认为师者必须自身在德才上过硬。唐仲友说：“持不圆之规，不足以为轮。引不直之绳，不足以为矢。”（《愚说·治教篇》）只有自身摆正，经过言传身教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老师没有尽心尽职就可以从学生身上反映出来。反之也一样，他说：“善为教者，反诸身而已。枝瘁，必其根之枯；影曲，必其木之枉；察之于彼，反之于此，薄反吾仁，偷反吾性，慢反吾礼。身正而教，不行未之有也。”（《愚说·治教篇》）而且，他还认为，“自身正”在治教中起着主导地位，比被所治教人的因素还要重要。同时从学以致用教育宗旨出发，陈亮认为应使学习者树立起这样的观念，即注重实际，从社会现实出发，来考察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成败得失，并培养他们解决现实社会各种问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则需经受千锤百炼，承受各种社会实践的考验。他说：“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只是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岂其于本质之外换出一般，以为绝世之美器哉。”（《陈亮集》卷 28《又乙巳春书之一》）

世界上的人是错综复杂的，有聪颖，有愚鲁，有敏捷，有迟钝之分，如何让不同脾性的人能

受到良好教育并有所得是件不容易的事，这要根据其具体的特性来加以调教感悟。唐仲友说：“以德行道艺教民以《诗》、《书》、《礼》、《乐》造士人，皆自尽其才以力于学，其大而为圣人者，固已无所不通，其次为贤为士君子亦各以其所能表见于世，下而医卜祝史之流皆世其业，虽至衰世，其子孙犹能守先人之典籍，各举其职见于问答之间。”（《悦斋文钞》卷8《学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知识的接受能力是不同的，教育者应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陈亮说：“童子以记诵为能，少壮以学识为本，老成以德业为重。年运而往，则所该愈广，所求愈众。”（《陈亮集》卷24《赠武川陈童子序》）吕祖谦主张教育者应根据“人资质各有利钝，规模各有大小”（《吕东莱文集》卷5《与学者及诸弟》）的特点，加以诱导，不能强求划一，统一施教。

他们主张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师生间都应该求同存异，互相探讨，以求教学相长。学者们认为即使“道合志同之志”者也总会有许多分歧，正如吕祖谦所说：“人之相与，虽道合志同之至，亦不能无异同”（《吕东莱文集》卷20《杂说》）为学若“任私心而行，私心所喜则感，不喜则不感；所见者感，所不见者不感，如此则感浅狭”。（《吕东莱文集》卷13《易说·咸》）他们提倡不同的学术观点要泛观广接，以求“兼取众长”，获得提高。“为学最要识向背”，这是学者能否取得较大成就的关键。陈亮在其讲学的讲义结尾多有“与诸君参考同异”、“与诸君商榷”、“试与诸君共之”、“吾将与诸君共学焉”（《陈亮集》卷10《六经发题、语孟发题》）之类的话，可见他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叶适也大力提倡师友间的相互讲习和学习，认为《礼记》中所说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是很有见地的，称赞孔子倡导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文人相轻、相互攻讦之鄙习，古已有之，因人废言，因言废人充斥每个朝代，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此，唐仲友认为：“不专主一说，不务为苟同，隐之于心，稽之于圣人，合者取之，疑者阙之。”（《苏平仲文集》卷5《说斋先生文粹序》）

对于受教育者，学者们则提出要敢于存疑，勇于创新，寻根问底，应该有“知其所以然”的精神，强调“看书须存长久之心”，认为学无止境，要不“讳过自足”。

吕祖谦鼓励学生“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合，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吕东莱文集》卷20《杂》）他还说：“学者，……欲进之则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则不可进乎道矣。故成心存则自处以不疑，成心亡，然后知所疑，小疑必小进，大疑必大进”。（《吕东莱文集》卷20《杂》）可见，存疑对于求学具有的独特作用。光存疑还不够，关键是要跳出藩篱，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叶适也提出，在学习中切忌人云亦云，应勇于创新，形成自己的见解，即使是粗糙的，不成熟的，也胜过沿袭他人之说，“譬之人家觞客，或虽金银器照座，然不免于假借。自家罗列仅瓷缶瓦杯，然却是自家物色”。（吴子良：《林下偶谈》卷2“叶适与陈耆卿对话”条）

而“学者最不可悠悠”，学习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陈亮认为，学习不能只知皮毛，不解其意，应该学一门专一门。他指出：“士之于学，农之于田，朝斯夕斯，舍是奚安！……不虔不力，误我丰年。工贵其久，业贵其专。”（《陈亮集》卷10《耘斋铭》）吕祖谦提出“看书须存长久之心”（《吕东莱文集》卷20《杂说》）。他说：“大抵立天下之功，必悠久胶固，然后能成。若振动躁扰，皆作易辍，安能成功？”（《吕东莱文集》卷13《易说·恒》）为此，他要求学生“肆业有常，日记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一岁无过百日，过百日者，同志共摈之。”（《吕东莱文集》卷10《乾道五年学规》）不光如此，学习者还要认识到学习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凡读书，临事曾去里面讲究理会，便见得不容易，岂敢妄言。凡言之轻发而不知难者，以不曾下夫也。”（《吕东莱文集》卷17《论语说》）

学而知不易,学者们鼓励学生学习要勤奋,下苦功,孜孜以求,并指出学习是无止境的。“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人皆病学者自以为是,但恐其未尝学耳,使其果用力于学,则必将自进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不能自反自强,皆非真知者也。”(《吕东莱文集》卷 16《礼记说》)进而他指出凡是好向别人炫耀的人,一般也是没有学问的人。“无文学者,恐人轻其无文学,必外以辞采自炫,实有者却不如此。”(《吕东莱文集》卷 12《易说·谦》)唐仲友强调刻苦、专心对学习的重要,他说:“奕秋,小数也,专心致志而后有所得;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学而能专心,其有功亦犹是也。”(《悦斋文钞》卷 8《学论》)陈亮也要求教育者必须“孜孜不倦”,在求学的道路上“不自满足”,强调“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为足,而尝以其未能者为歉,一日课一日之功,月异而岁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后已。”(《陈亮集》卷 24《赠武川陈童子序》)

综上所述,南宋浙东学派从分析当时的教育现状出发,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立足事功,始终围绕“学贵务实”、“经世致用”、“因人施教”、“学兼艺事”这些实用之学,大胆抨击传统的教育制度,否定“桎梏人才”的科举制度。针对当时教育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病提出了改革教育制度以“拯救衰世”、“雪耻图强”,并具体阐述了教育所涵盖的内容,论述改革教育制度的措施,还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提出了详细、具体的要求。其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在批判中系统化,在教育实践中完整化,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有不可抹杀的重要意义。诚然,南宋浙东学派的教育思想较多的是针对当时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是对他们自己具体教育实践的体会和总结,因而缺乏更深层次、更精密的研究。同时,对南宋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批评,讲了些过头话,这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造成的,在总体上毕竟是次要的。

On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the Scholars of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EN Anjin

(Institute of Cultur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Scholars of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raised a series of theories and viewpoints 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hich evolved into utilitarianism educational thoughts with naïve materialism in the comparative system. The penetrating expositions and original views in them still exert great guidance and reference to today's teaching practice.

Key words: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Educational thoughts; Utilitarianism; Practical; Teach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